

記朱家驊先生

勞 幹

儀表羣倫殷憂社稷

朱驢先生從五十二年逝世以來，到現在已經快八年了。在這八年之中，他的政績還時常在人們的心中存在著。當驢先生逝世後，我會做過輓詩，並代做公祭的告聖文。紀念性的文字卻只在大陸雜誌做過一篇『蔡萑悲憤詩出於僞託考』，未曾涉及驢先生的生平。現在中外雜誌王成聖先生來信索有關驢先生的文字，我想確是應當做的。只是過去別人的文字已有不少，難以下筆，現在只就想到的做一個補充，無法求全求備的。

儀表羣倫日，殷憂社稷時。衡陽歸雁地，曠古一通之。我亦江湖客，當年欲獻詩。及今餘涕淚，回首望何遲。

學殖昭新績，崇公二十年。憂勤思惜晷，風範想淳淵。方在歸賢後，何期更播遷。東郊遺念在，丹縷志桓桓。

客歲殘冬日，曾來長者車。百年爭瞬息，萬里更踟躕。悽愴徐君劍，蕭條賈傅居。老成凋謝甚，愁讀茂陵書。

以上是當時我對於驢先生的輓詩。第二首第七第八兩句指的是南港中央研究院院址和建築的建立完全是驢先生的功績。凡是到中央研究院的人都會想到他的辛勤締造。至於『丹縷志桓桓』一句，實在只是文字上的修飾，對於樸實實用的中央研究院的建築並不切題。卻未料到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以後建造朱家驊先生紀念館真

用了宮殿式，成爲中央研究院內唯一的宮殿式建築。「丹雘志桓榭」就真有着落了。當然，這只是一個巧合，民族所長凌純聲先生決不會爲實現這句詩才爲駱先先生做宮殿式紀念館的。

就中央研究院的建立與發展來說，駱先先生是繼續蔡子民先生來做院長的。蔡先生的特長是度量 and 風格，以儒家的修養爲基礎加上西方的自由思想，來做全國學術風氣上的領導。朱先生卻走的不同的路子。朱先生是發展事業的典型人物，在朱先生一生之中對國家對民族所做的事實是不可計數。雖然因爲客觀環境不好，使事業上有許多挫折，但算起來成功的還是不少。誠然，事功的影響往往只在一時，而思想的影響往往可達百世。不過朱先生所創建的事業，不管成功到一個什麼程度，可謂沒有什麼毛病。蔡先生提倡的思想，絕大部分我是非常尊重的，其中一小部分，只有『以美育代宗教說』，我就從前未曾贊同過，現在不曾贊同，將來也不會贊同的（宗教和美育完全是兩個不同的範疇，雖然有一部分相關，其主要部分決不能互相代替。因爲這是蔡先生說過的從來未曾有人敢表示過不同的意見，但當仁不讓於師，實在不應該盲從的。）知人論世實在太難了，所以思想和事業，那一個輕，那一個重，也就很難有所軒輊。

保全杭州生命財產

駱先先生在政海進退多年，卻對人從不說謊話。駱先先生生平對起居與服相當講究，但從不治生產，每次去職以後仍然一無所有。駱先先生辦黨多年，並且擔任過組織部長。但他從未曾用辦黨的機會，發展過任何的小組織。駱先先生是從德國式的教育訓練出來的，做事一板一眼，非常認真，但對於朋友對於屬員，對於學生，卻有深厚的人情味。這些都是很可取的地方。

駱先先生具有絲毫不苟的作風是隨處可見的。他曾經擔任過中山大學校長和中央大學的校長，完全一本他的

嚴格負責的作風去辦。在那個時候，不論華北或南方，許多大學中，尤其號稱爲名教授的，往往不肯盡職講授，時常缺席，並且過了二十分鐘才上課，上課又不肯悉心講功課時常談閒話。一般教授也跟著學樣。這種不負責的作風，瞞先生是痛心疾首的。他任職後加以整頓很有成效。所以任何一種消沉偷惰的風氣，縱然由於社會中堅分子來造成的，只要安心整頓，還是事有可爲的。

在朱先生所有事業之中，牽涉太廣。並且我都是局外人，只能就現有史料中，加以剪裁。即就朱先生紀念冊及年譜來說，已非此一篇短文所能敘述，若再旁徵其他史料，更難下筆。就簡略的印象來說，朱先生在任教育部長期間，重要的事業要算國立編譯館的建制，及統一中外地名譯名的計劃。在交通部長期間，那時成就更爲重要，例如開始整頓招商局；購買元亨利貞四艘海船，整頓航空事業，籌還郵局債務，將郵政儲滙局資金集中上海一事，改爲在各地地方放款使用，並且創立全國的電話網。這些工作都完成了，只有一部分是受到了抗戰的影響以致未竟全功，但貢獻已經不小，而電話網的裝設對於抗戰前途更有極大的貢獻。尤其重要的，是任浙江省主席的時候，阻止了決隄來堵阻敵軍的計劃，在這種決定之下，全部錢塘江三角洲的人，都免除了浩劫。朱先生又首先否決了杭州焦土抗戰的計劃，保全了杭州全城的生命財產，並且保全了千餘年西湖的文化遺產。以他爲先發表反對焦土抗戰的談話，使全國城市除去長沙桂林少數大城以外，都保全下去。如果不是朱先生發表這個談話，那就得使中央政府失掉了全部淪陷區的民心，其後果的嚴重是不難想像而知的。

反對焦土抗戰政策，朱先生可以說是全國第一個人。焦土抗戰是在日軍深入以後，一部分與論界提出的。這些人的想法是拿破崙征討四方，無不勝利，只有在莫斯科一戰完全潰敗，就是由於俄人誘敵深入，然後用焦土政策來打擊法國人的。但是焦土政策在俄國可以用，在中國卻不能用（也只是十九世紀初年的俄國可以用，到了希特勒打俄國時，俄國並未焚毀莫斯科，只在斯達林格勒集中全力作一次生死鬪爭的主力戰）。十九世紀初年的俄

國，地曠人稀，交通不便，深入以後，後方交通線太長，處處都有被截斷的可能，至於中國的長江流域，人口繁密，決不能把所有大小城鎮，全部毀掉（那樣日本人還有辦法，自己卻沒有辦法了）。在日本人方面，長江就是一條理想的交通線，不論那一個季節，軍艦上下都可以通行無阻（當然夏天好些，可是冬天也一樣可以暢通到宜昌和長沙），不像俄國那樣，可以把法軍糧道完全截斷。所以焦土政策是一個徒害百姓，無裨抗戰的事。當時杭州的駐軍已經準備這樣做了，朱先生以省主席的職權，全力阻止，並且還以他的看法告訴江西省主席熊式輝和湖南省主席張淪中，熊式輝聽了朱先生的話保存了南昌，張治中卻不聽朱先生建議，仍然斃毀了長沙。

繼丁文江為總幹事

朱先生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在丁文江先生逝世後，蔡先生即請他擔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在朱先生擔任浙江省主席的時候，總幹事的職務臨時請假，到民國二十七年朱先生仍然回到中央研究院，當時蔡先生健康情形很壞，在香港養病，由朱先生代理院長職務，一直到民國四十七年。二十年間負責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職守，並且當過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行政院的教育部長及行政院副院長。在這個期間，重要的事情，有中央研究院各所的遷移問題，在抗戰時從南京遷長沙桂林昆明及四川各處，復員時又遷回南京，再從南京遷到臺灣。從南京遷出遷回交通的問題，而從南京再遷臺灣更有許多人事問題。朱先生排除萬難，終於在南港安定下來，並且恢復了好幾個所，如其知道內情的人來想，簡直可以說是奇蹟。此外民國三十年由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中央博物院和中國地理研究所組織西北史地考察團，繼續前西北考察團未竟之業，也是在朱先生主持之下做成的。到民國三十七年，中央研究院院士制度的產生更為中央研究院樹立不拔的基礎。此時朱先生又兼任教育部長，值得注意的事，第一是極力提倡國語，第二是建議恢復修身功課，第三是重視學生通學（即走讀）的制度。提倡國語的重要早已盡人

不必重述。修身一科是久已作廢的功課，由公民來代替，這是一個非常失當的事。朱先生把它恢復過來，真是目光如炬。所可惜的是受了環境的牽制，修身還是不能獨立講授，直到現在還是叫做「公民及道德」。這仍然很不適宜的。因為（一）公民和修身完全是兩件事，離之則變美，合之則兩傷。（二）「道德」名稱不如「修身」好，因為道德屬知識範圍，修身為實踐範圍，修身是要「做」的，不是要「說」的。所以我衷心希望有關教育職責的，能照朱先生遺志，把修身能獨立的恢復（不必事事學美國人）。至於通學制度的重視，是朱先生考察臺灣後得來的結論。當時大陸上一般人的主張，是盡量修建中學宿舍，而主張把全部學生住校的。這件事看來是增進教學的效率，實際上流弊極大。因為：（一）學生宿舍太浪費，其建築費及維持費等於把可以辦兩個學校的錢只給一個學校用。教室荒美國已感到了，中國更用不著中學宿舍這個奢侈品。（二）宿舍的訓育全由學校負責，通學的訓育由家長負責。學校方面精力難周，不如家長負責的好。所以多數宿舍的學生是「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更容易成爲過激思想的溫床。（三）學生住宿失掉家庭的溫暖，容易變成古怪。（四）尤其是住宿的學生容易發生風潮，給學生平添許多不必要的麻煩。（通學制度也有弊病，第一是學生費時間在交通上面，第二，少數不負責家長對於子弟失教，引起了少年問題。但比較大陸上宿舍制度還是弊病少些）。所以在此還是要推朱先生的遠見。

料定李宗仁不可靠

到了民國三十八年，蔣總統引退，朱先生仍留行政院任副院長，未同進退，這是朱先生甚爲歉然的事。不過朱先生早已預料李宗仁不可信任，留在行政院可以監視李宗仁。到了共產黨提出「八項二十四款」時，李某已有意投降，而朱先生首先堅持原則，張羣先生支持朱先生意見，這樣才能撐下去，而布置總統復職的機會。所以朱先生留在行政院仍有其決定的作用。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是民國二十年成立的，朱先生是其中的董事，不過朱先生的影響力量最大，尤其二十二年以後用英庚款來打通粵漢鐵路，更是他一手促成，對於後來抗戰前途，關係極大。此外英庚款每年考送學生赴英留學，造就人才不少。到了臺灣，因為粵漢鐵路淪陷，英庚款利息無著，但其節餘款項美金二十萬元，還能用來補助中央研究院購置南港地皮，後來中央研究院能恢復工作，完全靠地皮尚未大漲時，購置的院址作為基礎。如其不然，那就工作無法推動了。

中德的國交向來是敦睦的，而德國民族性認真，對於中國幫助極有價值。中國在蔣總統領導之下建軍，德國顯問甚為盡力，其中許多交涉工作是朱先生做的。等到第二次大戰的時候，中國對德國人比日本人稍好一點，但許多德國人仍然入了集中營，朱先生頗不贊同。二次大戰以後，朱先生是主張中德迅速復交的，不幸外交當局也因觀望而耽擱了。以後中華民國和西德迄未復交。如其現在中國和西德尚有國交，那麼中國在歐洲就有一個可靠的據點，對於國家的利益是不可以數計的，在此真要佩服朱先生的遠見了。

股肱之勤維公實多

當朱先生作總幹事及院長以來，因為沒多少事務的事和他接洽，一直未曾深談過，直到中華民國三十一年我參加了西北史地考察團，在出發以前他才詳加指示。他對於開發邊疆是有相當大的宏願的！在實行開發以前確實要做一些必要的準備。西北史地考察團的正式目的，還在新疆和西藏，因為西藏太遠，只有留着以後進行，而新疆又因為當時盛氏尚未和中央合作，沒有法子前往，只好限於甘青寧陝四省地區，史地考察團暫時分為歷史和地理兩組，地理組主要的是考察青海省的柴達木盆地及祈連山，歷史組考察敦煌和居延的邊塞，敦煌千佛洞以及陝甘兩省的新石器時代的彩陶遺址（彩陶遺址是石璋如先生做考察工作的，對於周初的文化甚有裨益）。

到了臺灣以後，在一個偶然機會中，我曾經替朱先生代做了送人的壽詩，以後朱先生就找我來做應酬文字。直到朱先生因健康不佳，辭去院長職務為止，我曾經替朱先生做過不少次數，因為這些應酬詩文都是只講技巧而不講性情，我未曾存稿，現在都不可蹤跡了。到了民國四十七年，朱先生已經辭職，由胡適先生擔任院長，就接著開第三次院士會議，選舉新院士。這是到臺以後第一次的院士選舉，也是朱先生任內籌備了多年的計劃。我在這一次選舉中當選院士，並接著當選中央研究院評議員，每次院士會議和評議會，朱先生向來是到會的，而且時常有建設性的建議，對於胡適之先生幫助甚大。

朱先生平時並非一個辯才無礙的人，他說話時雖然條理清晰，曲達事情，可惜語調上比較平坦，不能激動聽眾的情緒。但他誠懇的心緒在態度上充分表達出來。在民國三十年時，他到西北去，青海省主席馬步芳對中央常有戒心，經朱先生誠懇的宣達，才完全釋然，馬步芳也在不久以後去重慶述職，和中央關係從此合作無間。這個例子可以證明真誠無偽是處人處事一個最高明的方法。這一點凡是接近朱先生的人都知道的，在胡頌平先生的朱家驊年譜和楊樹人先生的中央研究院最近十年已經都說的很清楚。

對我來說，最感人的一件事還是在我出國的前夕，朱先生親自到我家裏來看我，殷勤的叮囑要隨時和國內取得聯絡，並且時常回來和同人相聚。朱先生的身體已經非常衰弱，我看到他下汽車再上汽車回去，心裏非常感動，心想回來的時候一定要特別致謝他，不料竟成爲最後的一面了。（原載六十年三月號中外雜誌）